

史学新论

半个多世纪清史与中国历史 文化研究的结晶

——读《俊义文存》

李尚英

【提要】《俊义文存》内容涵盖了有关清史和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与评论，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之探析，还有相关的文史评说、图书序跋及人物纪念文章等，是王俊义半个多世纪学术研究的缩影。《俊义文存》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清史和清代学术思想史，精到分析和详密考订清代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关注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研究；反映了王俊义人生经历和治学历程及其尊师重道、提携后进的情怀。《俊义文存》虽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但瑕不掩瑜，其学术价值还是值得借鉴与参考的。

【关键词】《俊义文存》 清史研究 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52(2018)01-0139-06

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王俊义的文集《俊义文存》（以下简称《文存》），凡分五卷，包括有关清史和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与评论，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之探析，还有相关的文史评说、图书序跋及人物纪念文章等，共137万余言，可以说是其半个多世纪学术研究的缩影。该书出版后，深受学术界好评，一些报刊陆续发表评论，诸如2017年2月22日《中华读书报》的《学术追求，人文情怀与大家风范——写在〈俊义文存〉出版之际》，2017年7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的《爱国经世情怀 五十余载弥笃》。笔者读了这部学术大著后，亦深受感染。本文旨在围绕该书内容，就王俊义的学术成就及其为人风范略作评述，以资海内外学术界交流。

一、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清史和清代学术思想史

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清史和清代学术思想史，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宏观论述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和学术思潮，综论清代学术思想的特色及其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其对清代乾嘉学派的一系列论述，更是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和影响。王俊义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的一代学人，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后，自觉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评论学术思潮、学术流派与学术思想人物。如乾嘉考据学派在清代学术思想上占支配地位，也是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不能绕过的一个重要课题。王俊义曾用极大精力投入此课题的研究，并陆续发表了多篇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以往因受教条主

义极左思潮的长期影响,学术界多认为,乾嘉学派是“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实行民族高压恐怖政策,许多知识分子为了逃避政治迫害,埋头于训诂考据之中”^①的结果。王俊义则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认为乾嘉学派的产生与形成,主要是康乾时代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加之统治者大力倡导儒家文化等各种因素导致的必然结果;文字狱对之产生形成虽有一定影响,但绝非是主要原因(第376、380页)。同时,他还对乾嘉学派学者著述进行分析,并详细勾勒了该学派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治学特点与学术成就。如,以乾嘉时期著名经史考据学家钱大昕为例,对所谓乾嘉学派只有考据而没有思想的偏颇观点提出批评。他从钱氏大量训诂、注疏、经史考据著述中,勾勒提炼出其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与经世主张,只不过是其表现形式与清初那些激进思想表现形式不同罢了。由此,王俊义又进而提出对乾嘉考据学派的评价理应“消除历史成见的影响”(第400页),在指出历史局限的同时也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历史肯定。上述观点在长期沉寂的思想界实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推进思想解放、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和影响。

二、精到分析和详密考订清代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

对清代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及重要历史人物进行精到分析和详密考订。诸如对“清初三大学案”“宣南诗社”,以及钱谦益、顾炎武、吕留良、黄宗羲、全祖望、龚自珍、魏源等,都有客观、公正的具体分析与评价。先谈王俊义对“清初三大学案”的评价。如所周知,从清初到现在,所谓“太后下嫁”、“顺治出家”和“雍正继位”之谜,始终是众口异词,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而各种说法中,均事出有因,有一定根据(第88页)。王俊义对各种说法的由来及其论争,都进行了认真的考辨,认为“太后下嫁摄政王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倘若有此诏,则太后下嫁即成定论,否则仍是一桩未了之历史疑案”(第93页)。他还强调指出,孝庄皇太后无论是否下嫁摄政王多尔衮,都必须看到,她在其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中,“在清初的统治集团中,可谓是一个位高权重、一言九鼎的历史人物,其为清朝的建立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不愧是一位经历清初三朝的杰出女性”(第90页)。关于“顺治出家”,王俊义认为,长久以来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的“顺治出家”,实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均系后人“演绎附会而成”(第96页)。关于雍正是否矫诏篡位还是正常继位,王俊义认为,长期以来相持不下的这两种说法,虽各有依据,各有其道理,但反映出“根据都不够充分,还有必要继续发掘新的史料”(第99页)。他还特别强调说,无论是哪种说法,“都不抹杀雍正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第99页)。王俊义的上述看法,都在继承前辈学者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补充和提高,颇令人信服。

此外,对于一些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复杂的、具有多面性的思想家和历史人物,王俊义均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予以较为客观、理性的分析,既不因人废言,也不因言废人。他以明末清初的钱谦益为例,就认为不能将之简单骂倒了事。王俊义在他的研究论文中,具体分析了钱氏荣辱浮沉复杂多变的政治人生,及其在经学、史学、文学方面的成就,论证了钱氏在明末清初学术演变中的地位 and 影响,认为钱谦益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抨击了俗学流弊,强调学以经世,促进了清初经世致用思潮的形成;提倡“通经服古”、“正经”、“反经”,并阐明“经”与“道”、“经”与“史”的关系,为经学在清代的复兴奠定了基础;以卓越的史学理论及编史、考史之实践推进了清代史学的发展;以古典现实主义的诗论、文论及诗文创批批判明中叶以来的拟古主义,为清初诗文的转变“导平先路”(第286页)。这就对钱谦益作了较为公允的评价。

再如,王俊义在宣南诗社研究上的贡献,可谓还原了历史面貌。过去学术界受文献资料的限制

^① 王俊义:《俊义文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74页。以下凡引此书时,只在文中注明页码。

及研究环境的困扰，对宣南诗社人员的组成与历史作用的定位都有些不符合史实的拔高，包括文史学界的著名大师和权威范文澜、陆侃如等都未能幸免。他们都认为中国近代的民族英雄林则徐是创立该诗社的领袖，著名思想家龚自珍、魏源等人都是该社主要成员，高度肯定诗社的性质“是鸦片战争抵抗派的母胎”和“维新思想的先驱”（第 631 页）。这些观点虽然一度受到个别学者的质疑，却依然流行不衰，仍为很多的国内外学者所引用。王俊义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勇敢地向前辈大师挑战。他通过大量的史籍梳理，对嘉庆初期至道光中期前后曾活跃于京师文坛的宣南诗社所产生的历史条件、参与的人物和活动地点，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推敲研究，最终认定该诗社创立于嘉庆九年，林则徐只是短时期参加活动，绝非是该社领袖；龚自珍、魏源等根本不是诗社成员。同时，诗社“与封建社会中一般封建文人结社的性质并无根本差别，所不同的是它更具有乾嘉时期学风、诗风特点”，其性质“不可能是鸦片战争时期抵抗派与清代维新思想的先驱”（第 637 页），从而澄清了历史真相。王俊义的这一学术观点，已为国内外学者所接受。

三、关注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研究

在传统文化研究中，王俊义在论及炎帝时说：“炎帝是中国远古文明的肇造者绝非空穴来风”（第 875 页），坚定地认为炎帝是中国远古文明的肇造者，炎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他指出：“只有将中国古代文明的肇造与炎帝的伟大历史功勋联系起来考察，才能更深刻地领会炎帝是中华始祖的文化内涵”（第 873 页），从而更深刻地领会各地祭祀炎帝及举办“世界华人寻根节”一类活动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王俊义在读万卷书并结合走万里路的考察活动中还认为，晋东南地区存在着大范围的有关炎帝的遗址群落，补充和印证了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的“华夏文明将锁定晋南”（第 852 页）的见解，并进一步得出了该地区“与整个中华文明寻源的工作似存在内在的联系”（第 852 页）的重要观点。

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王俊义非常重视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其中对著名社会活动家、中西学术贯通的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论十六字真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第 936 页），进行较为完整的解读，并强调指出，费老立足现实站在时代高度，倡导各种不同文化都提高自觉，和谐相处，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共同去创造“天下大同的美好社会”，同时“期望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创造更先进的现代中华文化”，“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第 938 页）。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动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研究会历届会长的领导下，王俊义和研究会其他领导组织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多卷本《炎黄汇典》的撰写，以及各种论文集的编写，并多次与大陆、港澳台有关部门商谈，联合召开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又与菲律宾陈延奎文教基金会举办“中华文化优秀著作奖”活动。这些会议及活动（《文存》中多有体现）之所以能取得许多重要成果，是与王俊义以身作则，并倾注了大量心血与智慧分不开的。

四、七十余载学海泛舟，半个世纪的清史情缘

王俊义在五十年代的学术生涯中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与家庭背景的。本书中的《出版前言》《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以及王俊义关于著名明清史学家、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郭迎秋和著名清史专家戴逸、袁定中、王思治等师友对自己的亲切教导、提携和帮助的回忆，都有十分生动而逼真的体现，其情其景颇令人感动。

王俊义于 1937 年 1 月出生在河南省封丘县一个贫苦农民之家。其父于抗日战争时期投入国民党

军，早在1938年台儿庄大战时阵亡，留下孤儿寡母，生活十分艰难困苦，常常衣食无继。到六七岁时，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母亲克服重重困难，将其送到村中私塾读书。此后，在颠沛流离中，经伯父和兄嫂帮助才断断续续读完小学与中学。王俊义始终刻苦自励，有志于学。至1956年，终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革命史专业，开始迈入学术殿堂，师从何干之、胡华、戴逸等名师。1960年毕业后留校，在哲学系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与研究。

“文革”中，中国人民大学被撤销，王俊义不得不到江西省余江县五七干校，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文革”后期，中国人民大学的老校长、著名明清史学家郭影秋，建议成立清史研究机构，以从事清史编纂和研究，经核准于1972年成立清史研究小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前身），并从各个系所调专业人员到该组工作。戴逸老师考虑到王俊义原有的中国思想史基础，推荐他到清史研究小组担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任务。当时，郭校长和戴老师都谆谆勉励教诲他：“在清史领域进行研究耕耘，大有用武之地，要有志于把清史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第1111页）从此王俊义与清史研究结下不解之缘，清史也就成为他终生的研究方向，经过多年的勤奋努力，写下大量著述，逐步成为清史、清代学术思想史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在海内外学界也颇有影响的学术大家。各种媒体都不断报道他的学术成就。2014年2月，河南省封丘县电视台为在各领域做出突出成就的封丘原籍著名人士制作《魅力封丘·人物篇》，王俊义也被选入其中。在为他制作的专题片解说词中说：“战火中出生，苦水里长大，七十余载学海泛舟，半个世纪的清史情缘——清史专家王俊义。”此专题片广为播出，影响颇大。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恢复重建，原挂靠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清史研究小组也正式组建为清史研究所。从清史研究小组到清史研究所，作为专业研究人员的王俊义始终担负重要工作，从行政事务到专业研究，一直是双肩挑。特别是清史研究小组刚成立时，人手不足，王俊义还兼做行政办公室工作。

清史研究所成立后，当年即开始招收研究生。在研究所党政领导的安排下，王俊义从研究生入学考试、录取，直至担任研究生班班主任，都参与其间。他从清史研究小组刚成立时的一个最年轻的研究人员，直到担任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各种各样的行政事务，王俊义都投入了极大精力。他经常是白天处理各种行政事务，到晚间常常是到了深夜才能读书写作。王俊义历年来承担的《简明清史》《清代人物传稿》及其他不少论著的写作任务，大都是在如此艰难环境中完成的。王俊义先后获得副教授、教授职称，获得研究生导师资格及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王俊义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工作，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之职。在从事繁重的编辑、行政工作的同时，王俊义从未间断清史研究，不时有著述问世，直至1999年退休。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的经济建设与文化事业得到迅速发展。2002年底，党中央、国务院鉴于清代历史与现实社会的密切关系，以及为实现几代国家领导人提出的纂修清史的愿望，决策启动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以著名清史专家戴逸教授为主任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正式成立，决定集中海峡两岸乃至海外的清史研究力量，编纂一部大型的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最高水平的清史巨著。此时，王俊义心情十分激动和兴奋，决心为此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早在国家清史工程启动之前，王俊义即应戴逸教授之邀，从清史编纂的立项论证，到编委会的成立，以及其下属机构的设立，均参与了酝酿和讨论，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建议。在清史编委会工作期间，王俊义先是被安排到编委会下属的出版组工作，以组织联系清代历史文献资料与清史研究论著的出版。在出版组工作期间，他与组里的同事密切合作，组织出版了《文献丛刊》《档案丛刊》《编译丛刊》《研究丛刊》等各类图书，经过多年的努力，至今已出版了十多亿字的珍贵清代历史文献和中外清史研究论著。这些工作，既服务于清史编纂，又推动了清史研究，同时也抢救了大批历史文化遗产，是一项泽及当代、有利后世的美事。与之同时，王俊义还负责图书出版的评论宣传，组织编委会内外专家撰写

清史编撰研究与已出图书的评介。这些成果陆续在《清史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光明日报》上刊载，后来还汇编成《清史编纂研究与评论》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出版组的工作告一段落后，编委会又安排他到通纪组工作，协助编委会主任戴逸先生审读通纪各卷书稿。对这项工作，王俊义深知其重要性，全力以赴，认真对待，丝毫不敢懈怠，因而得到了戴先生的高度肯定与赞扬。戴先生在王俊义一份审读报告中批示说：“读王俊义先生的意见，他对工作做得细微、认真、用力，非常好，对提高稿件质量很有帮助”，在戴先生的建议下，王俊义的意见被转发到各组，“供审改专家参阅”。这是对参加编纂工作的各位专家的要求和鞭策。就王俊义个人而言，戴先生的高度肯定和赞扬既是对他一种激励，也是一种鞭策，鼓舞他更好地工作。现在，王俊义因各种原因辞去了他的固定兼职工作，但对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关心却一直不减，不时撰写有关评论。如最近对编委会重点文献项目《焦循全集》发表公开评论，继续向海内外宣传清史工程的进展。

五、尊师重道、提携后进

与治学相辅相成的是，王俊义尊师重道、提携后进的风范亦值得称道。他对于曾教诲过自己的领导、老师和前辈，都几十年如一日，铭记不忘，执弟子之礼，尊敬如初，并撰文深情回忆。读者可从《俊义文存》窥见一二。如在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革命家、明清史学家及“（自己）人生道路上的尊师”（第1106页）郭影秋病榻前，聆听其口述一生的经历，而后整理成《往事漫忆》一书，以启迪教育后人。郭影秋逝世后，他还写过多篇文章缅怀纪念。再如现任国家清史编委会主任的戴逸教授，是王俊义的业师，对王俊义的教诲有数十年之久，既是王俊义研究清史的引路人，又为之搭建了一个个研究平台。对戴师的教导培养，王俊义更是终生铭记，同时又在接受培养的过程中，也尽量为自己的老师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帮助其处理兼职的具体事宜，为其撰写学术评传，协助戴师培养清史研究人才。评传对戴先生为清史研究事业贡献的毕生精力进行了系统评述。

在尊师重道的同时，王俊义对于史学界的后进新锐也尽可能给与提携扶植。他对清史研究所的诸多研究生，不仅在专业上指教，政治上关爱，生活上关心，而且为他们出版著作创造条件，亲自撰写序跋和评论，尽力推荐。对社会上的中青年学者也是大力关照。这在《文存》中都有生动体现。当年曾受到先生提携、扶植的一些研究生和青年学子，如今不少人已成为专家学者，但他们都能饮水思源，不忘前贤，对先生尊敬有加，常以“恩师”称道。这方面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人们都知道，著名清代学术思想史专家黄爱平教授，在谈到王俊义时所说：在校期间，自己“深受教益，毕业后有幸留所任教，又多得先生提携。”（第1186页）黄爱平教授也始终对自己的这位恩师执弟子之礼，谦逊有加。就我而言，我虽然不是王俊义名下的学生，但在1991年与其相识后的二十多年中，得到先生许多帮助与指导，对我学业的发展都有很大益处。

六、余论

王俊义先生是我一向敬重的当代著名学者，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以研究清代学术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当代文化著称于世。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写下了大量著述。主要著作有：《清代学术与文化》（合著）、《清代学术文化史》（合著）、《清代学术探研录》等，主编或参与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百卷本）等十余部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以及百余篇学术论文、文章。这些论著在海内外学术界大都引起了应有的反响和关注。又早在1989年应邀至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作访问教授，为该所研究生讲授“清代学术思想史”、“清代学术文献选读”；1998年又应邀到我国台湾地区的暨南国际大学讲授“清代学术思想史”、“中国古代文献学”等课程；2002年应邀到菲律宾马尼

拉主讲清史专题，并先后到我国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台湾大学、政治大学、清华大学、淡江大学、东海大学、中兴大学、成功大学、中山大学以及香港、澳门等地访问讲学。20世纪90年代，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王俊义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精力，此后又担任该会常务副会长、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炎黄文化研究》主编。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开展的各种学术活动，同样凝聚着王俊义先生的许多心血和智慧。王俊义1999年在原有工作岗位退休后，又于2003年参与国家清史纂修工作，先后在此国家重大学术工程的出版组和通纪组担任特聘专家。《俊义文存》就是从上述著作、论文中选取，并增加了在国内外讲学的部分讲稿，以及在炎黄文化研究会和国家清史编委会工作期间所写的论文、文章。

笔者在对《俊义文存》给予诸多高度肯定的同时，认为该书也有些美中不足：其一，全书选录文章涉及的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此间学术研究随着时易世变，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一些文稿尚留有时代的痕迹。如作者从康熙与乾隆南巡比较的角度，对康熙南巡持肯定的态度，而对乾隆的南巡则持奢靡挥霍、劳民伤财的否定看法，认为乾隆南巡等活动“使清王朝从盛世的顶峰上跌落下来，由盛转衰，终至一蹶不振”（第111页）。但如从更加客观与理性的角度看，对乾隆南巡完全持否定的观点的确有些偏颇。其二，作者在半个多世纪中，一定程度上因工作环境、工作岗位多变，致使所写的文章内容难免广而驳杂，内中也有少数文稿属应景之作，实际上可不加收录。

但瑕不掩瑜，《俊义文存》的学术价值还是值得借鉴与参考。王俊义的学术成就和贡献还不仅表现在上述几方面，这里不过列举其主要几点。王俊义已年过八旬，仍在为清史研究及中华传统学术文化研究事业发挥余热，如撰写各种评论，参加各种学术研讨。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笔耕不辍。我们在此衷心祝愿王俊义先生永葆学术青春，继续圆自己美好的清史研究之梦！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编审、学报前副主编

责任编辑：龚赛红

**The Crystallization of More Than Fifty Years of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and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Reading *Collected Papers of Wang Junyi*
*Li Shangying***

Abstract: *Collected Papers of Wang Junyi* is an epitome of Wang Junyi's academic research of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It includes studies and reviews of the academic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as well as of the history of the dynasty, explorations into and analyses of China's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critiques,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and articles in memory of people. These articles appl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studies of the academic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as well as of the history of the dynasty, accurately analyze and elaborately examine some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and prominent historical figure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focus on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embodying Wang Junyi's life experience, scholarly research and ideas that value honoring teachers and esteeming truth and assisting younger generation scholars. Though the book is not free from deficiencies, its academic value is worthy of reference.

Keywords: *Collected Papers of Wang Junyi*; studies of the Qing Dynasty; traditional culture